

新高堂書店： 日治時期臺灣最大的書店

蔡盛琦（國史館助修）

摘 要

本文介紹日治時期臺灣最大的書店—新高堂書店。書店的創設人是村崎長昶，在日治初期即來臺，創設書店，一家原來販售學生文具用品的小書店，因正逢日人移民增加，殖民教育的推行，書店銷售的各級學校教科書大增，使書店迅速發展，成了全臺首屈一指的大書店。新高堂書店的業務範圍，也由最初的販售書籍文具，到日文圖書進口經銷及出版，其出版的種類則多是辭典、參考書等，也成了當時民間重要的出版社；戰後村崎長昶回到日本，該書店開始由國人自己經營，並更名為東方出版社，以出版兒童及青少年讀物為主，負起光復後國語教育寓教於樂的社會責任。

關鍵詞：村崎長昶 新高堂書店 圖書出版 圖書經銷。

一、前言

臺灣在清代統治時期，因移民性質，人口少，文風不盛，連雅堂在其著的《臺灣通史》中曾說過：「臺灣僻處海上，藏書較少（註1）。」到了日治初期，一些知識份子返回大陸，留在臺灣的文人，也不以科舉為目的，在社會未靖階段，喜歡以吟誦詩詞應答，來抒發心志，所以閱讀的中文書，多是一些文學作品的中文線裝書；一般民間所使用的書籍則是曆書、休

閑性的章回小說、歌仔書等。

在當時的環境下臺灣的書店可分為兩類：一是中文書店；一是日文書店。中文書店部分，當時尚無具規模的書店，僅有的幾家如大稻埕中街的苑芳、振芳、玉芳，和南街的建芳，以批發演義類的章回小說為主，還有一些歌仔書、山醫命卜相、曆書及私塾的教科書等，主要是以售線裝書為主，其性質與現在文具店性質類似（註2）。日文書店方面，多是日人移臺所開設的，其性質也是不脫文具店的性

質，除了販售書籍、文具外，同時也販賣一些學生用品等。

到了大正年間，臺灣本土語言閱讀結構發生丕變，一方面是日本移民來臺人口大增，尤其是第一位文官臺灣總督田健次郎上任以後，日本移民來臺人口大為增加；另一方面是臺灣受日本殖民教育人口比例增加，日本人以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推廣日文及日語的使用，使得日語人口逐漸普及（註3），使得對日文書籍的需求增加；這時日人經營的小書店陸續漸具規模，並伴隨著移民人口增多，書店的銷售量也隨之增加。

相對日文書店的增加，幾家販售線裝書為主的中文書店，則漸形衰退。這種情形一直到文化協會成立後，一些知識分子希望以文化輸入的方式，提昇臺灣的漢文文化，於是創辦中文書店，如蔣渭水先生經營的文化書局、莊垂勝的中央書局及連雅堂先生的雅堂書局等也陸續在這段時間成立，引進了不少有關社會問題，思想性的中文譯作或著述（註4），但是不論在規模上或數量上，仍無法與日人經營的書店相抗衡。

根據持田辰郎在《東都書籍株式會社台北支店史》（1946年）中所敘述的：這時期一流書店有台北的新高堂書店、文明堂書店、杉田書店、台中的棚邊書店、台南市的小出商行；而二流程度者有基隆市的新原書店、新竹市的犬塚書店、嘉義市的吉川山陽堂、高雄市的南星書店、山形屋書店、花蓮港市的並木學生堂。其他則為三、四流的書店，其販賣額均極微少，勿寧說其是以書籍為副業較符合現況。其中直接能從出版社批書者只有新高堂書店

等幾家，其他則透過內地經銷業者間接購入（註5）。此時的書店中，新高堂書店列為當時臺灣的最大書店，以下則來談新高堂書店的創設。

二、新高堂書店的創設

新高堂書店的創設人是村崎長昶（1870-1950），他是熊本縣人（註6），於日本治臺初期即來臺灣。由於日治初期日本政府尚不允許以個人身分前往臺灣，村崎長昶的堂兄竹下康之，當時擔任臺灣總督府內務部土木課代理課長，在他的堂兄幫忙下，謀得陸軍省雇員一職，以雇員身分，於明治28年（1895）隨陸軍來臺，當時年方二十五歲。

來臺不久村崎長昶即因臺灣當時陷入物價不穩定的狀態，村崎本人亦罹患瘧疾，再加上所任官職幾無昇遷希望，而提出辭呈。辭職後的村崎仍留在台灣，開設了「村崎事務所」，開始經營工程承攬業和水路運輸業，其後又從事土地家屋的買賣借貸業務，結果業務更形發展，資產不斷增加。明治31年（1898），村崎以「新高堂」的商號，在台北市榮町一丁目開設文具店，兼營書籍販賣，並逐漸改以經營書店為重心（註7）。

新高堂書店剛開業時書店原本只是販售書籍、文具外，兼賣運動用具、樂器類、手工藝品等的文具店性質的小商店，它快速竄起與當時開業時周遭同業書店的消長有很大的關係，當時臺灣日文書店的始祖城谷書店，因為店員挪用公款而倒閉；新開的太陽堂書店店舖在改建中因資金問題而中輟，最後因信用問題而衰敗；另一家專營小學教科書與學業用品的並木書店，則因家庭因素而歇業；而原本在西

門外的舊書店杉田書店、文明堂書店這時也遷來新高堂所在的榮町；匯集了文化人的買氣，所以新高堂書店一開業生意即步入上軌道，伴隨著學校的增設，日文教科書預約銷售等，新高堂書店的營業額逐年增加（註8）。

到了明治37年（1904）時日俄戰爭爆發後，在臺日人官民爲此戰役一股狂熱，日俄戰爭的雜誌大賣，預約雜誌的訂單湧入，五百本、一千本的大量進貨，也無法供應，原本定價15錢的雜誌，馬上漲到20錢賣出。日俄戰爭結束後，書店其他書籍的銷售額仍日益增加（註9）。

但是書店真正轉型成具規模的書店，應是在大正初年，那時井村大吉任台北廳長任內，他著手開始臺北市內的建設；先是美化新公園，並將位在西門外的散墓遷移，艋舺舊市街與大稻埕新市街之間的水田低地，經填土後成了住宅地，使兩市街得以連結，然後是商店街的改造，拆掉許多土造木造的舊屋，改建成二樓以上的磚瓦建築。新高堂在這段期間配合市內建設，拆掉了舊建物，重建新樓，1915（大正4）年，新高堂成爲紅磚建造三層樓建築，面積270坪的大書店（註10）。

落成後的新高堂書店，它的配置是：一樓陳列雜誌、二樓陳列圖書、三樓供集會場娛樂的場所；在一樓入門顯著的地方擺滿了通俗雜誌和文具，至於極少量文學方面的書籍，以及其他教科書之類的書籍，都放置在後面或二樓（註11）。整棟樓最初是由台灣瓦斯會社爲廣告宣傳提供免費的瓦斯照明，從一樓至三樓縱橫的瓦斯線，將整棟樓照得燈火通明，壯觀無比，後來才改爲電燈照明（註12）。

三、經營業務

此時的新高堂書店業務不單只是售書，並擴大經銷範圍，且開始了出版的業務。大量的出版品都是以日文刊行，相對的中文圖書的進口受挫，造成許多臺灣讀書人不得不看日文書，使得日文圖書銷售隨之增加，這些圖書都是由日本進口，當時從日本進口圖書要經過檢查，新高堂書店對於所販售的圖書，也是先經過挑選，不販售禁書，且儘量配合當政者的政令。經銷圖書生意擴大後，開始也出版一些工具書、圖書、文藝性的書籍。以下則先談書店的零售與經銷。

（一）零售與經銷

新高堂書店圖書的銷售管道，除了門市零售及經銷給其他書店外；各公小學校教科書也由新高堂供應；而總督府圖書館的圖書採購也是由新高堂負責提供。

1.門市零售待大正時代，臺灣居民教育較爲普及，人口增多，日本人移民來臺也大爲增加，印刷技術也有顯著進步，加上五四動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影響，雜誌數量急速增加（註13）。而在日治時期，臺灣的書店所經手的出版品中，雜誌比重較一般圖書高（註14），因此當時臺灣許多出版品，文藝、學術教育、財經、法政等刊物大部分都是以雜誌型式刊行。而一些通俗雜誌成了新高堂重要的販售項目，像這些的通俗雜誌有《婦女俱樂部》、《主婦之友》、《少年俱樂部》、《少女俱樂部》、《少女之友》等，以上都是新高堂最暢銷的雜誌。

反而在東京普遍受知識份子喜愛的雜誌如《中央公論》、《改造》等，因爲在臺灣遭到查禁，所以新高堂書店並不銷

售；當時只要不利於臺灣總督府的論著，都列為禁書，這一點村崎長昶也相當小心的不觸犯當局的禁令。

至於圖書方面，賣的也多是一些大眾讀物，至於利潤少而銷路短的高級專門書刊，牽涉到思想性的刊物，因為怕進口後銷售不出去，則較少販售（註15）。

2.供應各級學校教科書：除了通俗雜誌、特價書外，新高堂書店並獨占供應臺北市小學、公學校的教科書，連供應官私立中學、高女、商校、醫專和臺大的教科書也是由新高堂供應，並擔當其他島內不足之教科書的補充，隨著文化的普及，門市經常是顧客爆滿，每當船運書籍雜誌送達時，店內圖書雜誌堆積如山，當時全島輸入圖書的大半幾由新高堂經手，可說是盛況空前（註16）。這使得新高堂成了全臺首屈一指的大書店。

新高堂書店除了壟佔教科書市場、並經銷一般日文圖書的進口，定期在《臺灣日日新報》刊登廣告，是當時是少數長期刊登廣告的書店。

3.經銷：前面已經說過在日治初期的書店，都是一些文具店性質的小書店，所以圖書的種類並不多，許多人需要書籍都是直接向東京或上海訂購以運送或託人帶回臺灣。等到有較具規模的書店後，才開始以船運方式寄達。但是以販售日文書籍的書店，因為裝船運費約為書定價的5~7%，如果照圖書定價銷售，則根本沒有利潤可言，因為賣剩的書亦幾乎由零售書店自行處理。所以書店業者時組織「臺灣書籍商組合」（註17），並在1922時立即通過普通書籍的臺灣售價應為「定價加一成」（教科書、教

學用書籍、小學校參考書、臺灣出版物除外）。最初這種方式引起讀書人的反對，例如《臺灣日日新報》即在自己社內設置書籍部，依書籍定價銷售，以抗拒「臺灣書籍商組合」定價加一成的作法，達數年之久，但最後終因不堪虧損，而不得不將其所餘圖書讓渡給新高堂書店（註18）。

這種透過內地經銷業者間接買入的方式，隨著日本語的普及，日文圖書的需求增加，從1930年起才開始有日本的出版社每年到臺灣來與書店直接交易，如三省堂、大阪的駸駸堂、松谷啓明堂等，直接交易對象臺北仍以新高堂書店為主要對象（註19）。

但是到了昭和15年（1940）時，日本本土成立「日本出版配給株式會社」（簡稱日配），是一書籍雜誌配給的組織，為了配合戰爭的宣傳、刊印宣撫用的刊物，除了出版印刷用紙統一管理，對於出版品的銷售也統一批發。所以在臺北市昭和17年（1942）4月時也成立「臺灣出版協會」，由當天出席的會員中選出十五名董事，村崎長昶亦名列其中，該協會的目的是限制印刷用紙和出版物的配給管理，使臺灣與日本內地採同一步調；於是臺灣出版協會配合「日配臺灣支店」，任何書籍雜誌的批發改交由日配臺灣支店統一處理（註20），這使得新高堂書店的圖書雜誌的經銷業務也深受影響。

4.提供總督府圖書館的圖書採購

在大正3年（1914）時，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成立，位在總督府旁邊的新高堂負責總督府圖書館的普通書及線裝書（日本內地刊行之線裝書）的採購。書籍以日文

為主，其採購方式是：新高堂書店將新書置於圖書館書櫃中，由館內負責採購人員選擇所需圖書，經過挑選之圖書，依一定程序購買，不需要的圖書即通知新高堂，將圖書移走，這種採購方式對圖書館來說是很方便的（註21）。

新高堂書店除了經營書籍經銷、店頭販賣之外，亦有著手於圖書的出版。

（二）出版

當時臺灣的出版業，由於日本出版業的移植，使得日文書籍的出版佔出版事業的大部份，從出版機構來看可分為三種，一是官方機關之出版，所編印的研究調查報告書統計資料等，大部份都是非賣品；二是民間出版社，例如以專門出版精緻書聞名的是，西川滿的「媽祖書房」、「日孝山房」，以出版文學類圖書為主；三是書店兼營出版，當時具有規模的書店往往也兼營出版業務，如杉田書店、大木書房、清水書店等均有出版圖書；這三種出版業構成日治時期臺灣出版的主軸，在所有出版品中，配合政令的官方出版品佔了大部分，根據《臺灣統治綜覽》一書中記載明治41年（1908）時，官方出版品已多達200多種；新高堂書店雖是屬民間出版機構，但出版品卻也不脫官方出版品的色彩，其出版物以辭典或參考書類為多，亦出版一些配合政令的學術性出版品，當然還有為數不少的教科書，例如《算術受験準備書》、《算術解法の真髓》、《國語受験準備書》、《國語と算術》、《小公學校兒童參考書》等。

最早的出版品是明治38年（1905）出版的，伊能嘉矩編的《領臺十年史》、《臺灣巡撫トシテノ 劉銘傳》兩冊書；

從大正年間到戰爭前新高堂每年都有圖書的出版，如大正3年（1914）時出版了橫澤次郎編的《兒玉藤園將軍逸事》、相馬禎三郎編的《臺灣農業教科書》；大正4年（1915）時出版了戶島嘉吉編《地方開發街庄巡り》、石川忠一編《臺灣警察要論》；大正5年（1916）出版劉克明編的《國語對譯臺語大成》、山下江村所編《臺灣海峽》；大正7年（1918）伊能嘉矩著的《傳説に顯はれた日臺の連鎖》、金平亮三編的《臺灣有用樹木誌》；大正9年（1920）出版藤井常登及中村柳一所編《臺灣教育國語必攜》；大正10年（1921）出版了福田要撰《臺灣の資源と其經濟的價值》；大正11年（1922）出版杉房木助的《日臺會話大全》；大正15年（1926）時出版劉克明所編一系列的《書翰文例》、《國語速修》、《臺灣語及書翰文》等；到了昭和年間出版的有：昭和2年（1927）出版武內貞義撰的《臺灣》、還有新高堂自己編輯部所編纂的《臺北市街圖》等；昭和4年（1929）出版了石川宙平著《南洋遊記》、加藤謙一著《臺灣に於ける花卉園藝》；5年（1930）劉克明撰的《臺灣古今談》、6年（1931）宮地硬介著《臺灣吾見たリ》、10年（1935）出版了《新制臺灣地理概説》、《新選臺灣語教科書》等。這時期還有出版少數文學類圖書。如則是到後來才有出版，例如昭和6年出版的柴山武矩著的《突風》、昭和9年（1934）出版了土岐適著《鏽了的寶劍》及昭和12年（1937）長木重夫著《悲哀的現實眼睛》等（註22）。

到了昭和12年（1937）以後，這段戰爭時期除了推行皇民化運動外，並由軍方

統制一切，各種物資缺乏，要採配給制，並且徵調作家到各處寫下見聞鼓吹戰爭，受戰時影響出版減少，並且出版方向是配合戰時的需要，如1941年的《臺皇民鍊成講話》、1943年臺北帝大編的《南方土俗》、南部二郎著的《最新自習安南會話大全》等，出版品幾乎是為政策服務。

在此限制下，書店經營都呈現停滯狀態，這一切要等戰後才將有另一番景象的復甦。

五、戰後的新高堂書店

由於新高堂書店經營的成功，村崎長昶一直擔任「臺灣書籍商組合」的組合長職務，並曾任台北市協議會員、台北信組理事、台北倉庫信組監事、東海自動車監查役、中央市場監查役、台北實業界理事、大同會會長等職，算是當時台北實業界執牛耳人物（註23）。村崎長昶雖然職務頭銜繁多，事業重心仍是新高堂書店，他至老仍坐鎮店內，指揮店員。

村崎長昶擁有良好的政商關係，是新高堂書店經營成功的因素：同時他網羅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新書的採購；大量的教科書也是經由新高堂出版經銷；並且是臺灣唯一可直接進口，不必透過經銷商進口日文書的書店；當然地點位處繁華地段也居重要因素，它位在臺北市榮田町一丁目，新公園附近，即現在的重慶南路、衡陽路口，座落於台北市繁華路段，與台灣總督府、台灣銀行毗鄰，是榮町、本町的交叉點，當時在這個地段還有文明堂書店、杉田書店，匯集了買書的人氣。

以上這些因素造就了新高堂書店的經

營成功，但是隨著戰爭的結束，「臺灣書籍組合」也隨之解散，村崎長昶一家人黯然揮別離開臺灣。新高堂書店則於1945年12月，由游彌堅派員租下新高堂書店（註24），改稱東方出版社；1951年3月由林呈祿繼任董事長，一直到1967年才改任顧問。

戰後的東方出版社在林呈祿的經營下，出版了不少的好書，在戰後臺灣的中文書籍出版仍極依賴上海幾家老字號出版社，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時，東方出版社成了當時少數碩果僅存的本土出版社。它出版的宗旨是，要做好教育工作，一定要從兒童開始，所以鎖定兒童教育的基礎扎根工作，積極編印小朋友所用的《學生國語辭典》、《小學輔導教材》，發行量遍及全省，並以出版兒童讀物為主，翻譯世界名著，改寫古典作品為白話文，它的出版品伴隨著戰後兒童一起成長，到現在依然是臺灣重要的出版社。

附 註

註1 連雅堂著，臺灣通史 卷二十四〈藝文志〉中所列東海藏書：「方志十五種，凡二百卷；臺灣人士著書四十種，凡二百零三卷，宦游人士著書八十種，凡一百六十卷，共計一百三十五種五百六十三卷。」當時藏書量不多。

註2 春丞，「日據時期之中文書局」台北文物 3卷2期（民43年8月），頁131-132。

註3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

- 層之研究（臺北：正中，1992），頁318，在1915年時的戶口調查顯示，臺人中能聽、講日語者，僅佔總人口數的1.63%。頁359，1932年時懂日語的臺人，已佔總人數的22.7%，1940年以後，懂日語的人數，已激增達280餘萬人，佔人口總數的51%。
- 註4 此處的中文書店是以販售中文圖書為主的書店，但除了雅堂書店不賣日文書外，其他的仍是有賣日文書，如中央書局就特別向東京的岩波書店、京都的弘文堂等書局聯絡，代銷他們的書刊。
- 註5 書店的狀況，在持田辰郎，東都書籍株式會社台北支店史中有敘述。持田辰郎於1928年台北高等商業學校畢業後，同年進入三省堂。1934年4月1日，以東都書籍株式會社台北支店支店長的身分，到台灣赴任。在撤離台灣之後，整理出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台北支店史（1946年稿本）。本段轉引自河功原作，黃英哲譯，「戰前臺灣的日本書籍流通（上）—以三省堂為中心」 文學臺灣 27期，頁257。
- 註6 王一剛，「日籍紳商人物誌」 台北文物季刊 2卷4期（民43年1月），頁87。
- 註7 村崎長昶，記憶をたどつて八十年の回顧録（東京：村崎敏昶，1983年），頁45至50。
- 註8 同上註，頁52至53。
- 註9 同上註，頁57。
- 註10 同上註，頁61。
- 註11 「新高堂日治台灣最大書店」 聯合報 34版（民84年11月18日）。
- 註12 同註7，頁62。
- 註13 張圍東，「日據時代臺灣的雜誌小史」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 7卷2期，頁70。
- 註14 河功原作；黃英哲譯，「戰前臺灣的日本書籍流通（上）—以三省堂為中心」 文學臺灣 27期，頁259。
- 註15 洪炎秋，「懷益友莊垂勝兄」 傳記文學 29卷4期，頁82。
- 註16 同註7，頁65。
- 註17 大正11年（1922）時，臺灣的書籍販售業者都須加入為「全國書籍商組合聯合會」的會員，稱為「台灣書籍商組合」。
- 註18 河功原作；黃英哲譯，「戰前臺灣的日本書籍流通（中）—以三省堂為中心」 文學臺灣 28期，頁285。
- 註19 同註14，頁261。
- 註20 同註18，頁300-302；「戰前臺灣的日本書籍流通（下）—以三省堂為中心」 文學臺灣 29期，頁206-209。
- 註21 張圍東，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2年），頁132。
- 註22 同註7，14，18，20及查自國家圖書館的全國圖書資訊網聯合書目。
- 註23 屋部仲榮編，新臺灣の事業界 成文影印，民88。
- 註24 在東京的中目黑亦有新高堂書店，是由村崎長昶女婿敏昶於1948年重新設立。